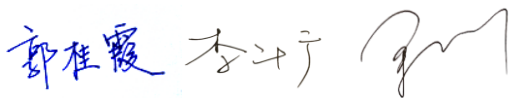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博士科研文献学术水平认定申请表

博士生姓名：杨超	学院：国际经济研究院	专业：世界经济
学号：201701150122	导师：庄芮	字数：2.1 万字
文献题目：基于贸易视角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母国效应研究文献综述		
<p>文献摘要及与学位论文的相关度描述：（500 字以内）</p> <p>随着国际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效应日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部分学者从贸易、产业结构、就业、技术进步等多个维度出发，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宏观经济带来的综合效应，更多的学者则是选择其中一个维度进行深入探讨。本文首先梳理对外直接投资母国综合效应的相关研究成果，包括就业效应、产业发展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进而聚焦对外直接投资母国贸易效应，从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贸易规模效应、贸易结构效应和贸易条件效应三方面入手，分别梳理上述三方面的国内外研究成果。最后，本文基于上述研究成果的梳理进行文献评述，提出对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再思考。</p> <p>通过撰写该文献综述，为进一步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贸易效应奠定了分析基础，在学位论文分析角度、分析重点、分析方法上均提供了有益借鉴。</p>		
<p>三位同行专家认定意见</p> <p>该科研文献从贸易、就业、产业发展、技术溢出等多个维度出发，全面回顾了国内外学者在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效应方面的研究成果。该文献引证丰富详实，分析逻辑清晰，重点突出，已达到学术水平认定标准。</p> <p>同行专家签字：</p> <p>签字日期：2022 年 4 月 26 日</p>		
<p>导师认定意见</p> <p>经本人及同行专家鉴定，该科研文献已达到学术水平认定标准，建议进行博士申请学位科研成果折算。</p> <p>导师签字：</p> <p>签字日期：2022 年 4 月 26 日</p>		
<p>培养单位审核意见</p> <p>同意</p> <p>主管院领导签字：</p> <p>签字日期：2022年5月8日</p>		

基于贸易视角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母国效应研究 文献综述

随着国际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效应日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部分学者从贸易、产业结构、就业、技术进步等多个维度出发，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宏观经济带来的综合效应（Kokko，2006；李京晓，2013；陆书哲，2017），更多的学者则是选择其中一个维度进行深入探讨。本文第一部分主要回顾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就业效应、产业发展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贸易效应的相关研究将在第二部分单独回顾。

一、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综合效应研究

（一）就业效应

对于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母国就业，学术界尚未形成较成熟的理论，但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可能产生替代效应和促进效应，并影响就业结构。

1.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产生替代效应

持替代效应观点的学者普遍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带来的出口增加并不足以弥补对国内投资和消费的挤压，进而对母国就业产生替代效应，但这种替代效应并非一成不变。**从时间维度看**，对外直接投资在短期内对母国就业产生替代效应，而在长期则扩大了母国就业规模。Slaughter（1995）利用美国 1977-1989 年 32 个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假设短期内企业资本固定，通过调整劳动力需求促使生产利润最大化，长期内所有生产要素均可进行调节，并加入时间因素分析东道国工资变化对美国就业的影响，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在短期内缩小美国就业规模，而长期则扩大了美国就业规模。

从国别差异看，国家间收入水平的差距会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母国就业效应。Brainard 和 Riker（1997）研究发现东道国的工资替代弹性会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就业作用，在工资替代弹性较小的国家投资，对母国就业的替代作用小；而在工资替代弹性较大的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投资，对美国就业替代作用较大。Braconier 和 Ekholm（2000）基于欧洲企业的研究发现，在收入水平较高地区的投资对欧洲地区就业有替代作用，而在收入水平较低地区投资的就业替代作用不显著。Wagner（2006）基于英国、Becker 等（2005）基于德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

2.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产生促进效应

有学者基于行业、企业和地域角度的实证分析，得出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母国就业的结论。**从行业角度看**，Lihey（2003）通过对日本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和国内就业关系的考察，发现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显著增加了日本的就业岗位。Chen 和 Ku（2005）对台湾制造业的考察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正负两方面效应，一是通过提高生产率减少台湾当地就业，二是通过扩大产出增加对台湾地区劳动力需求，总体上，对外直接投资对台湾制造业有显著的促进

作用。

相反, Braconier 和 Ekholm (2001) 基于美国的研究则发现, 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减少了母国就业需求, 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增加了母国就业需求, 尤其是提高了科技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在就业中的占比。蒋冠宏 (2016) 基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发现, 与其他类型相比, 商贸服务类投资显著促进了母国的就业增长, 且投资高收入国家的就业促进效应更明显。

从微观企业角度看, Harrison 和 Mc-millan (2006) 基于美国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发现垂直型对外直接投资减少了母国就业规模, 且与东道国收入水平无关; 而水平型对外直接投资对就业有拉动作用, 且与东道国收入水平有关, 对低收入国家的水平型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拉动作用显著, 对高收入国家的投资则作用不显著。Masso (2008) 通过对爱沙尼亚企业的考察, 发现母国企业与子公司就业存在相互促进关系, 且这种促进关系在服务业中更为显著。

国内研究方面, 张婷婷 (2006) 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模型, 以湖北省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为研究对象, 发现开展对外投资的企业与未进行对外投资的企业相比, 前者对于就业的促进作用较大。李磊等 (2016) 对中国企业的考察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就业产生了显著促进作用, 但不同投资动机类型对就业影响存在差异, 企业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公司的就业效应受行业类别的影响, 而水平型对外直接投资和垂直型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公司的就业效应, 受投资目的地国家收入水平、中间品进出口以及最终品进出口的影响。

从地域角度看, 对外直接投资对就业结构的影响还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Head 和 Ries (2002) 的研究发现, 日本在低收入国家的投资提高了母国劳动技术密集度, 但这种正向作用随着投资向高收入国家转移而逐渐消失。Navaretti 和 Castellani (2010) 对意大利和法国的研究发现, 在不同地区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 在收入水平较低的地区投资, 短期内对母国的就业效应不显著, 但长期将增加母国产出进而增加就业。

部分国内学者采用省际面板数据展开实证分析, 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就业的创造效应总体上大于替代效应, 但存在省际差异。姜亚鹏和王飞 (2012) 利用省际面板数据, 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有促进作用, 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地区存在一定替代作用, 中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则对本地区就业有较大拉动作用。张建刚等 (2013) 以 30 个省份 2003-2010 年的面板数据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就业效应及各地区间差异, 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创造效应大于替代效应。廖庆梅 (2017) 利用 2003-2012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 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各地区就业均有显著促进作用, 对于中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大。

3. 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母国就业结构

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影响母国就业数量, 也影响母国就业结构。Hanson 等 (2003) 基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发现, 对外直接投资减少了美国国内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 增加了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Hijzen 等 (2005) 将新古典贸易模型进行扩展, 对英国 1982-1996 年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进行分析, 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减少了国内对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也有学者

基于瑞典和台湾的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均有增加，但熟练劳动力的增加幅度更大（Bandick 和 Karpaty，2007；Chen 和 Ku，2005）。

对外直接投资对就业结构的影响还与东道国的收入水平有关。Simpson（2012）利用英国企业微观数据，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国内就业结构，发现在低收入国家的投资减少了英国国内非熟练劳动力，但增加了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Elia 和 Mariotti（2009）基于意大利的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减少了母国对低技术劳动力的需求，同时在高收入国家的投资还降低了母国国内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

（二）产业发展效应

对于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学者从正负两方面出发，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导致的母国产业结构升级（正面）效应和母国产业空心化（负面）效应。

1.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

大部分学者的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母国产业结构升级。但也有部分学者持相反观点，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甚至产生了抑制作用。

（1）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母国产业结构升级

欧美发达国家最先关注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母国产业发展的影响，学者基于发达国家的实证研究发现，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转移相对落后的产业，能够促进母国的产业结构升级。Bergsten 等（1978）利用 1965-1971 年美国 75 个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检验对外直接投资对美国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美国国内的产业升级。Dunning（1981）通过对英国的实证分析得出，英国通过对外投资转移本国相对落后的产业，不仅没有使本国出口规模减少，反而促进了本国产业的转型升级。Deschryvere 等（2013）利用芬兰的相关数据验证了企业的对外绿地投资对母国企业研发成本、研发劳动再分配的影响，并进一步证实了其对母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新兴工业化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迅速扩大，不少学者的研究对象转向日本、韩国等，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促使母国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由低级向高级发展。Blomstrom 等（2000）利用日本海外企业的相关数据，验证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发现日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促进了日本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进而实现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进程。Liang 和 Bing（2011）基于韩国的研究也证实，韩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促进了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新兴工业化国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得技术、人才等战略资产，促进母国生产率提高，从而间接带动母国产业升级。Amighini 和 Rabellotti（2010）的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得新技术进而带动母国产业升级，对外直接投资带来的逆向技术溢出是发展中国家实现技术追赶的重要渠道之一。Herzer（2011）通过使用 33 个发展中国家 1980-2005 年建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实证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产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发现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能够促进其产业 TFP 的提高。

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高速增长，学者开始关注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发展产生的影响，部分学者从宏观层面证实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产业结构升级效应。郑磊（2012）基于 2005-2009 年中国对东盟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采用灰色关联法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中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发现中国对东盟技术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和市场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国内产业优化升级。王英和周蕾（2013）选取中国 2005-2011 年 29 个省的省际面板数据，运用 GLS 方法实证分析发现，市场寻求型和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都显著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且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升级效应更为明显。潘素昆和袁然（2014）基于 2003-2012 年中国对 58 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数据进行的实证检验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升级作用存在滞后性，技术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升级的作用最明显，市场寻求型和资源寻求型的产业升级效应则相对较小。

也有学者从企业微观层面验证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及对异质性企业的差异化影响。袁东等（2015）基于中国 2002-2008 年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考察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公司生产率的影响，发现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促进了母国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且非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戴翔（2016）基于 2005-2009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叶娇和赵云鹏（2016）基于 2005-2007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母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且这种效应在不同行业间存在差异。贾妮莎和申晨（2016）基于 2005-2007 年中国 522 家制造业企业的实证研究显示，高中端技术制造业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显著促进了母国企业生产率的提高，而低端技术企业这种促进作用不明显；企业对发达国家投资对产业升级作用较明显，而对发展中国家投资则不显著。

（2）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

国际研究方面，Braconier 和 Ekholm（2001）基于瑞典企业和产业层面数据，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企业的生产率的提高并未产生显著促进作用。Falzoni 和 Grasseni（2005）基于意大利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考察了不同投资目的地对于母国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对发达国家的投资有利于母国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对落后国家的投资则不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Hijzen 等（2006）基于日本 1995-2002 年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面板数据，认为日本制造业对外投资对母国产业生产率的提高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Guerin 和 Dhyne（2014）基于比利时 1998-2008 年微观调研数据进行研究，甚至得出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企业生产率提高存在抑制作用，进而抑制产业升级的结论。

国内研究方面，张远鹏和李玉杰（2014）基于我国 2003-2011 年宏观数据的研究发现，虽然高技术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升级存在促进作用，但总体上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产业升级效应不显著。赵伟和江东（2010）基于 2003-2007 年中国 10 个省市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发展的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由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整体规模较小，其对国内产业优化升级的促进作用较小。朱彤和崔昊（2012）利用中国 1985-2008 年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从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研发资金溢出和逆向人力资本溢出两个角度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不存在显著作

用。尹东东和张建清（2016）基于 2003-2012 年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杨晨（2017）基于 2008-2015 年数据，利用 OLS 模型的实证分析甚至得出对外直接投资抑制国内产业升级的结论。

2.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空心化的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是否会导致母国产业空心化，学术界存在着争议。部分学者认为对外直接投资造成了母国的产业空心化，也有学者对上述观点持否定态度，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不必然导致母国产业空心化。

（1）对外直接投资造成了母国的产业空心化

Hewings 等（1998）运用投入产出法，基于美国芝加哥地区 9 大经济部门的数据展开实证分析，发现实体产业生产逐渐被服务业替代，物质产品的供给更加依赖其他地区，即经济结构进入了“空心化进程”。Minoru（2006）通过比较日本制造业就业人数与典型出口导向型行业就业人数之间的关系后发现，制造业市场基地的向外转移形成了对国内制造业生产的替代。Cowling 和 Tomlinson（2011）通过对日本机械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分析发现，二战后日本大规模的海外投资战略对母国制造业为核心的物质生产产生了抑制作用，使得相关行业的投资、就业和产出均出现了明显下降，制造业“离本土化”问题凸显。李兆磊等（2008）通过对日本经济中的土地资源尾效研究发现，以土地为代表的自然资源的长期紧缺和价格泡沫化，使得日本国内制造业的发展面临生产成本不断上升的制约，这造成日本经济的长期不景气，也间接引起了日本国内产业空心化。

（2）对外直接投资不必然导致母国产业空心化

不同的产业空心化判断依据会产生不同的研究结果。Lin（2004）基于台湾制造业的研究显示，若以制造业占 GDP 的比重衡量，对外直接投资会导致母国产业空心化；而如果进一步考虑母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的变化，则对外直接投资并未引起产业空心化。Kim（2007）也持类似观点，如果用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失业率、制造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等指标来衡量产业空心化时，研究结果显示对外直接投资并未导致台湾地区的产业空心化。

国内部分学者基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产业发展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尚未引起我国产业规模空心化和效率空心化问题，但随着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则不排除空心化的可能。石柳和张捷（2013）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 2004-2011 年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和产业发展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对外直接投资还未引起产业空心化；但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与“效率空心化”指标之间较高的灰色关联度说明，未来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继续扩大可能导致空心化的产生。杨亚平和吴祝宏（2016）以 2003-2008 年我国 1273 家制造业企业为研究样本，考察了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带来的“去制造业”问题，发现我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尚未导致“去制造业”。林建勇（2018）通过主要成分分析法构建了产业空心化指数，运用我国 29 个省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我国目前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整体上不会导致产业空心化，但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会导致东部地区产

业空心化。

（三）技术溢出效应

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日益显现出技术寻求型特征，大量学者开展了关于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包括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是否存在、作用机理、影响因素等多方面内容。

1. 对外直接投资是否产生了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1）对外直接投资存在逆向溢出效应

国外学者最先对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展开研究，Koght 和 Chang（1991）以 1976-1987 年日本对美国 297 个行业的投资行为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检验证实了对外直接投资存在逆向溢出效应，且认为最有利于获取美国先进技术溢出的进入方式是组建合资企业。Lichtenber 和 Pottelsberghe（2001）在理论探索方面具有开创性，他们创立 L-P 模型，将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渠道获取的国外研发溢出纳入国际 R&D 溢出模型中（C-H 模型），以全要素生产率（TFP）作为衡量母国技术进步的代理变量，发现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渠道获得的国外研发溢出显著提升了母国的全要素生产率。

而后，国内外学者在 L-P 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和研究，基于英国、日本、印度、中国等不同国别的相关数据展开实证分析，同样证实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Branstetter, 2006；Driffield 等，2009；Pradhan 和 Singh, 2009；Behera 和 Goldar, 2012）。陈强等（2016）对中国制造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实证分析，发现 2003-2014 年中国对美国、欧盟等 36 个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 TFP 产生积极影响，但由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晚、技术获取型投资比例低，逆向技术溢出较弱。

在技术溢出的作用机理上，学者从不同角度探究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路径。梁文化和刘宏（2017）认为对外直接投资通过研发费用分摊效应、研发成果反馈、产业集聚效应和人才流动效应的复合作用，实现母国技术水平提升。杨连星和罗玉辉（2017）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可通过学习和赶超效应促进母国技术进步，学习效应推动企业由模仿创新向自主创新发展，赶超效应促使企业致力于提升核心竞争力。尹东东和张建清（2016）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技术进步的渠道还包括研发平台共享、利用国外研发设施和成果等。赵宸宇和李雪松（2017）从理论上归纳出对外直接投资技术进步效应的 4 点作用机理：投资收益机制、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海外市场竞争机制和非技术渠道。

（2）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溢出效应不显著

部分学者的实证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溢出效应不显著。如 Bitzer 和 Kerekes（2008）基于 17 个 OECD 国家 1973-2000 年产业层面数据的研究、Dhyne 和 Guerin（2012）对比利时跨国公司的研究、白洁（2009）基于中国 1985-2006 年对 14 个主要国家投资的研究，均得出对外直接投资未对技术进步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刘明霞（2010）利用 2002-2007 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以专利数表征创新能力，发现在短期内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对

各种专利类型都有积极影响，但长期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仅对技术含量较低的外观设计专利数有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付海燕（2014）基于 10 个典型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发现，印度和俄罗斯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明显，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甚微。

2.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

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受多种因素影响而存在差异。**综合技术吸收能力**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学者通常用研发强度、人力资本、金融发展、技术差距和对外开放程度等指标来衡量。李梅和柳士昌（2012）基于 2003-2009 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发现上述指标均对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产生正影响，且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杜金涛和腾飞（2015）基于 L-P 模型引进吸收能力因素，利用 1985-2013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人力资本、研发强度和技术差距等吸收能力因素都会对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产生影响。

我国的综合技术吸收能力存在地区差异。吴书胜（2015）采用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R）展开研究，发现东部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研发强度、人力资本等方面具有优势，更容易从对外直接投资中获得逆向溢出效应，而中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则不明显。李梅等（2014）运用 2003-2011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省际面板数据，发现母国制度环境对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力地促进了该区域企业逆向技术溢出的实现，而中西部地区的制度环境在促进逆向技术溢出方面仍有待改善。

融资约束和金融发展水平是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技术逆向溢出的重要因素。罗军（2017）利用企业微观数据和门槛回归模型，并以融资约束为门槛变量，发现不同融资约束情形下，对外直接投资对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差异，当企业受到融资约束压力较小时，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技术创新有明显促进作用，融资约束较大时则不显著。殷朝华等（2017）利用 2004-2014 年省际面板数据，基于门槛回归模型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自主创新的影响存在基于金融发展的双门槛效应，当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大于较低门槛值时，对外直接投资对自主创新存在正向影响，当金融发展水平大于较高门槛值时，正向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东道国差异也是影响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沙文兵（2014）基于 2004-2010 年美国、澳大利亚等 12 个国家和地区的研究显示，逆向技术溢出与东道国创新水平、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正相关，与文化差异负相关。蔡东青、刘厚俊（2012）侧重于东道国制度环境，认为东道国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高效的公共治理和完善的技术市场体制能显著促进逆向技术溢出。

二、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

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是世界经济领域的经典问题，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从投资对贸易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条件效应等角度出发，不断对两者关系进行探讨，取得

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一）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规模效应研究

学者最早关注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规模的影响，大体可分为替代关系、互补关系及关系不确定。

1. 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是替代关系

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替代关系是指，增加贸易障碍会引发资本要素的流动，而限制资本流动则会促进贸易的发展。早期学者从不同理论出发，得出投资与贸易的替代关系。

完全替代论强调资本的跨国流动将消除国家间的要素禀赋差异，导致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相互替代。Mundell（1957）最早研究投资与贸易之间的关系，他放松了 H-O 定理中要素不可流动的假设，指出存在关税壁垒的情况下，如果两国的生产函数相同，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是相互替代的关系。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对外投资和国际贸易是企业不同阶段所采取的不同战略决策，且投资是比贸易更高阶段的企业行为。Vernon（1996）从比较优势的动态转移角度对美国对外直接投资进行研究，指出在产品“创新期、成长、标准化时期”的阶段发展过程中，长期对外直接投资会逐渐替代原有的出口贸易。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同样支持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是替代关系，认为企业对外投资存在内部化优势，在东道国生产和销售替代了原本母国的出口（Dunning，1979，1988）。该理论在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基础上，将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及区位优势纳入到一个框架下，研究企业开展对外经营行为，并假设利润最大化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唯一目标。随着企业跨国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各方面优势的不断积累，在区位优势以及所有权优势的有机结合下，对外直接投资会逐渐替代一国的出口贸易。

也有国内外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进一步考察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替代关系。Horst（1972）**从宏观视角出发**，以美国、加拿大双边贸易投资为研究对象，指出在关税影响下，美对加的对外直接投资会替代美加贸易发展。Helpman et al.（2004）将分析视角拓展至多国，利用 38 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会替代该国的出口贸易。Belderbos 和 Sleuwaegen（1998）**从微观企业视角出发**，利用 500 余家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数据进行分析，指出在贸易壁垒限制情况下，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有替代效应。Gopinath（1999）**从行业视角出发**，通过分析 1982-1994 年美国食品加工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额与其出口额的关系，指出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呈负相关（即替代）的关系。

2. 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是互补关系

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互补关系主要指，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在母国和东道国之间创造新的贸易机会，从而扩大两国的贸易规模。有关投资对贸易的创造效应的研究以 Kojima 的**边际产业转移理论**为发端，认为对外投资可以重塑母国与东道国的比较优势，从而带动两国

贸易量的增加（Kojima,1978）。该理论是 Kojima 根据日本企业对外投资的特点，在传统对外贸易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该理论放松了两国生产函数相同的假设，认为一国对另一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不仅仅是资本的国际转移，还包括技术、管理经验等无形资产的整体转移。

随着跨国公司的蓬勃发展，产生了以 Helpman 和 Krugman（1985）等学者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该理论进一步将规模经济及产品差异化等非市场因素引入到传统的一般均衡模型来解释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二者间的关系，并从中间品贸易的角度出发，强调跨国公司按照成本优化的原则进行全球生产布局，可以增加中间产品的企业内贸易，体现出投资对贸易的创造效应。由于跨国公司的整个生产链包括本国的“总部生产”以及分布在其他国家的“分链条”两部分，在国与国之间要素禀赋差异很小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完全可以将产品的整条生产链都置于“总部生产”的链条之下进行一体化生产，其贸易结果是一国出口本国所生产的部分差异性产品，同时从另一国进口部分同质产品。

在实证分析方面，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先后有学者采用美国、奥地利、瑞典、日本、韩国、中国等经济体的贸易投资数据，证实了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显著促进母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这其中既有学者**从宏观角度出发**，采用国别贸易投资数据进行研究。Lipsey 和 Weiss（1981）将东道国分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研究美国对这两类国家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指出对上述两类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都是促进的。Eaton 和 Tamura（1996）利用 1985-1990 年日本对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与贸易额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呈现相互促进的关系。项本武（2006）采用引力模型，分别从出口和进口的角度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的影响，指出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具有创造的效应，对外直接投资会带动原材料、机器设备等的出口；但对于进口而言，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大往往会较少进口规模。边婧（2019）基于 2003-2016 年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展开研究，发现总体上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进口效应和出口效应均为正，但对于不同经济体的作用不尽相同，对新兴经济体投资具有显著的出口促进作用，而对非新兴经济体投资具有显著的进口促进作用。

也有学者**从微观视角出发**，采用企业层面的贸易投资数据进行研究。Lim 和 Moon（2001）选取韩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的相关数据，指出在发展中国家建立子公司会显著带动产品的出口贸易。蒋冠宏和蒋殿春（2014）考虑到企业的异质性理论，利用 2005-2007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微观企业数据，运用倾向值匹配和倍差法进行实证分析，指出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整体上促进了出口，其中商贸服务型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毛琪琳和许家云（2014）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进行实证分析，指出对外直接投资不仅扩大了企业的出口规模，还提高了企业出口的概率。

还有选取**行业层面**的投资和贸易数据进行求证。Pfaffermayr（1994）基于奥地利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数据进行分析，指出奥地利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显著促进其对外

贸易的发展。任丽丽（2013）基于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的面板数据，发现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制造业进口和出口都有显著积极影响，且对中国初级产品和制成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影响均为反向。韩家彬和贺洋（2019）探讨了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出口效应，基于 2003-2017 年全球 30 个国家的面板数据，以系统 GMM 估计和门槛回归的方法，发现农业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具有贸易创造效应，且不同国家的贸易效应具有异质性，经济发展对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存在单一门槛，呈现倒“U”型特征。

3. 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不确定

随着对投资与贸易关系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既不是单纯的替代效应，也不是简单的互补效应，而是两者的综合效果，也与研究方法和角度有关。

一是从投资动机角度出发，研究了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效率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会产生不同贸易效应，既可能产生替代，也可能产生互补。陈培茹和冼国明（2018）采用 GMM 方法，利用 2007-2015 年的 184 个东道国的非平衡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资源寻求型和效率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均能增强扩展边际的出口创造效应和集约边际的出口替代效应；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会减弱扩展边际的出口创造效应和集约边际的出口替代效应。

二是从投资类型出发，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效应的影响取决于投资类型，水平型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产生替代效应，而垂直型投资则产生互补效应。Blonigen（2001）利用日本汽车的制造业、零部件也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数据，研究垂直型与水平型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得出垂直型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贸易创造效应，而水平型则对贸易产生替代效应。

三是从产业结构角度出发，顾雪松等（2016）通过 108 个东道国 2003-2011 年的面板数据，发现中国对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具有创造效应，随着母国与东道国产业结构差异的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的创造效应增强。

四是从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出发，认为对于资源丰裕型和发达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促进作用较为显著，对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促进作用显著，但进口促进作用不显著。柴庆春和胡添雨（2012）指出，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显著促进了出口规模的扩大。张春萍（2012）根据资源丰裕度和经济发展程度差异将东道国划分为三类，并利用 1996-2010 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进出口效应，且当东道国为资源丰裕的国家时，创造效应最为明显。

（二）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结构效应的研究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在关心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规模效应的同时，开始注重投资对贸易结构等产生的影响。

1. 贸易理论与贸易结构的决定

关于国际贸易理论主要包括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和新新贸易理论 4 方面。从古典贸易理论到新新贸易理论，体现出研究焦点从产业间贸易向产业内贸易、产品内贸易的过度。

古典贸易理论主要包括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和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这两个经典理论均假设完全竞争市场、产品同质、规模报酬不变、生产要素在各国之间不流动以及无贸易壁垒。斯密于 1776 年在《国富论》中提出绝对优势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各国间存在的劳动生产率差异和生产成本决定了各国间的分工与贸易，生产技术是国际贸易结构的主要决定因素。大卫·李嘉图于 1817 年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一书中提出比较优势理论，并阐述技术差异是各国同一商品存在价格差别的基本原因，也是决定各国专门生产和出口商品结构的基础。

新古典贸易理论提出各国间的要素禀赋差异是国际贸易规模及其结构的决定性因素。基于 H-O 理论的要素禀赋理论是新古典贸易理论的代表，最早是由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这一理论认为，各国间要素禀赋的差异使要素价格产生差异，进而导致生产成本和商品价格的差异，并决定各国的贸易结构。随后，一些学者又对要素禀赋理论进行了完善，斯托尔帕和萨缪尔森于 1941 年提出了 S-S 定理，认为关税可能提高一国相对稀缺要素的实际收益；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和雷布金斯基定理也对要素禀赋理论进行了拓展，提出要素禀赋的变化决定着资源配置的变化，进而影响贸易结构发生改变。

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产业内贸易不断扩大，并由此出现了基于市场结构变动和产品差异化的新贸易理论。**新要素贸易理论**从技术差距和人力资本两个方面对要素禀赋理论进行了修正和补充。首先，技术差距理论（Posner, 1961）认为技术差距能够影响国际贸易结构。作为生产要素的知识和技术决定了各国技术水平的差异，从而形成一国的技术优势；其它国家模仿新技术的仿效时滞和接受新技术的反应时滞共同决定了比较优势和贸易结构。其次，人力资本理论（Schultz, Becker 和 Arrow, 1965）以及新经济增长理论（Roemer 和 Lucas, 1986）将人力资本的知识效应和溢出效应作为一国贸易结构、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之一。

规模经济理论提出，生产规模的不同决定了一国出口商品结构。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最先提出的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模型，有效解释了产业内贸易的现象。该理论假设市场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且在垄断竞争行业中存在较多生产差异性产品的企业。在这种情况下，一国只能专业化生产和出口行业中的一部分产品，并从其它国家进口同行业中的其余产品，从而形成产业内贸易。一旦某国在生产某种产品上处于领先并扩大生产规模，便会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从而形成持续性国家优势，贸易结构更加稳固。

随着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以企业为核心的新贸易模式对以往的国际贸易理论提出了挑战。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假设企业是同质的，忽略了对贸易厂商异质特征的考察；**新新贸易理论**的出现恰恰弥补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在微观领域研究的不足，并为最新的国际贸易模式提供了理论支撑。伯纳德和詹森（2003）、梅里兹（2003）等提出了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基

于生产率差异视角对新的贸易模式和贸易格局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研究,解释企业的出口决策,探讨了异质性企业如何从事国际分工。

2. 促进贸易结构升级视角

学者主要从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产生影响,从而引发贸易结构转变的角度展开研究。部分学者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提高母国高技术产品的进出口比重,促进贸易结构升级**。唐心智(2009)对1982-200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及贸易结构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商品结构具有明显的改善和促进作用。隋月红和赵振华(2012)探讨了逆梯度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动机,并利用2003-2009年中国与46个国家的双边投资和贸易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顺梯度和逆梯度对外直接投资均有助于提升我国高技术产品的进出口比重,促进贸易结构升级。陈愉瑜(2012)对1982-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及贸易的时间数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滞后二期对母国贸易结构变化有正向的影响作用。

从国别差异看,对于发达国家投资和对发展中国家投资产生的贸易结构升级效应存在差异。张春萍(2012)根据资源丰裕度和经济发展程度差异将中国对外投资的18个东道国分为三类,并利用1996-2010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之间可能存在的国别差异,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进出口创造效应,且当东道国为资源丰裕国家时其创造效应最为明显。李杨和车丽波(2019)采用2003-2016年中国对49个国家贸易和投资的面板数据,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显著降低资本品和技术品的出口比重,提升初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而对发展中国家投资则显著提升资本品和技术品的出口比重,对初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无显著影响。

从我国地区差异看,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结构改善效应最为明显。李夏玲和王志华(2015)利用2003-2013年我国25个省份面板数据,对全国和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贸易结构效应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母国贸易结构改善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由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晚、规模较小,导致这种促进作用相对较弱,且从区域差异看,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结构改善的效应最为明显。

3. 异质性投资动因视角

异质性投资动因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结构的影响存在差异性。**Markusen 和 Maskus(2001)**指出,以降低贸易成本、开拓东道国市场作为投资动机的对外投资企业,其对外直接投资与本国出口贸易规模互为替代关系。**Patrie(1994)**通过研究发现,国际直接投资对本国贸易规模的影响效应会随着投资动因类型改变而产生变化,以降低生产成本为目标的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的互补效应相比于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更强。

刘海云等(2015)通过对中国2003-2012年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以获取资源为投资目标的对外直接投资会减少母国初级产业产品的出口,并增加其进口量;而以获取研发技术资源为投资目标的对外直接投资则会导致制造业产品进出口的双增加,即促进制造业内贸易规模的扩张。

刘新宇（2016）采用 2003-2014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升级的正向作用贡献最大，显著提高了中国高技术附加值商品的出口规模和比重。

4. 中间产品占比视角

有学者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最终产品的贸易具有替代作用，而对于中间产品的贸易则具有促进作用。Head 和 Ries（2001）通过对日本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的影响要根据产品的不同形式来分析。对最终产品投资而言，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是替代关系；但对于中间产品投资而言，对外直接投资会促进中间品的出口贸易。

陈俊聪和黄繁华（2014）基于 2003-2011 年我国对 40 个国家的投资和贸易数据，创建引力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指出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具有明显的创造效应，可以显著拉动我国零部件、机械设备等中间产品的出口，无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这种出口带动作用都比较明显。

5. 全球价值链视角

随着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不断深化，一些学者开始从价值链的视角出发，关注对外直接投资通过提升母国在全球价值分工体系中的地位，进而影响贸易产品结构。张宏和王建（2013）通过分析跨国企业的直接投资进入模式和企业价值链升级的作用，指出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跨国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促进国内技术进步。

刘斌等（2015）运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世界投入产出表等数据，从企业和行业两个层面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价值链升级效应，指出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提升跨国企业在全价值链体系中的分工地位，促进跨国企业的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多分支机构和研发加工型对外直接投资更有利于企业价值链升级，投资发达国家有利于企业产品升级，而投资发展中国家更有利于企业功能升级。

聂明华和徐英杰（2016）通过梳理全球价值链理论及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机理与存在性方面的文献，指出技术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实现全球价值链升级。

杨连星和罗玉辉（2017）利用我国 2003-2013 年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数据建立模型，从国家和行业两个层面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价值链升级的影响，指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能够现住地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但高新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价值链升级的促进作用不显著。

（三）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条件效应的研究

除贸易规模和贸易结构外，贸易条件效应也是学者在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贸易效应时关注的问题。相较于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对外直接投资对于贸易条件的改变相对复杂，

其影响可能是局部性和阶段性的。陈愉瑜（2012）基于 2006-2010 年我国 7 个细分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贸易条件改善，而流量则加速了贸易条件恶化；但从对贸易条件的影响程度看，ODI 存量和流量都不是最主要的因素，世界市场需求变化才是影响中国贸易条件指数变化的重要原因。

曹玲（2013）研究 2001-2011 年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条件的变动，发现：首先，随着投资额的上升，韩国价格贸易条件的略显恶化，但出口数量指数大幅上升，进而改善了韩国的收入贸易条件；其次，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韩国出口商品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提高了韩国单要素贸易条件指数；再次，进出口商品价格指数以及出口物量指数的变化，使韩国获得的静态贸易利益的效率不高。因此，韩国的对外投资额不是越高越好，须有效控制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从提高投资的质量入手促进韩国对外经贸的发展。

三、文献评述

（一）关于研究内容的再思考

已有文献从贸易、就业、产业发展、技术溢出等多方面探讨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综合效应，研究成果丰富。有关对外直接投资母国贸易效应的研究既有理论探索，也有基于全球主要经济体贸易投资数据的大量实证研究。早期的实证研究主要利用跨国公司的销售资料进行，研究也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对外贸易（出口居多）之间的关系为主。随着上世纪 70 年代后全球直接投资和贸易资料的健全与完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数据逐步成为实证检验的重要数据来源，时间序列分析开始增多，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贸易关系的实证检验也进一步扩展到新兴经济体。上述研究为本文进一步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贸易效应奠定了分析基础，提供了有益思路。

但已有研究存在如下两点不足：一是整体研究仍待丰富，探讨对外直接投资贸易规模效应的文献多，探讨贸易结构效应、贸易条件效应的文献较少；基于发达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现象的理论的研究多，基于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现象的理论研究少。二是基于中国国情的现实研究仍不足，特别是基于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和对外投资新特点（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由资本净流入国转为资本净输出国），研究对外直接投资母国贸易效应的文献较少。

（二）关于实证研究方法的再思考

自学者开始用实证方法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效应以来，研究资料不断健全，研究方法不断更新，细分领域不断拓展。实证检验采用各种不同方法、不同数据来源，对不同时期各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对外贸易进行分析，结论各不相同。通过比较，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效应产生影响的原因大致分为如下三类：

一是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效应与母国经济所处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有关。如，早期的实证结论中，投资对母国出口的替代关系比较明显，而近年来的这种实证结果在不断减少。

当然，这也不排除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全球直接投资快速发展的影响。对发达工业化国家来说，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作用也大不如前，所以发达工业化国家与母国经济的研究，近年来开始从母国贸易效应转向母国就业效应等方面。与此同时，与母国贸易关系的研究随着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活跃，以及近年新兴市场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正在成为这些地区和国家经济研究的热点。

二是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效应与母国跨国公司发展水平、投资动因和区位选择有关。从已有的对各国与母国对外贸易的实证分析看，欧美国家的母国贸易效应存在明显差异。从行业层面进行的实证研究也表明，不同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贸易效应亦存在差异，有的行业是替代效应，而有的行业则是互补效应。但是，跨国公司全球直接投资除动因、类型变化外，近年来区位选择也在不断变化，而大部分实证分析恰恰都没有考虑区位因素。

三是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贸易效应是动态变化的，投资对贸易产生的替代效应或互补效应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从长期趋势分析投资对母国对外贸易的影响，不仅仅表现为母国出口的增长，还可能影响到母国贸易结构的变化。更进一步，通过对外贸易还影响到国内的就业和收入水平变化，进而影响到国内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这种贸易效应的传导机制是值得思考的。这些都为今后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可能的空间。

总体上，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对外贸易，在一定程度上与母国当时的经济发展阶段、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对外直接投资的类型有关。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比本国落后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并不会完全替代出口，反而对母国出口有促进作用。随着时间的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贸易效应会有所变化，这种变化则往往与产业不同、企业海外分支机构的存续时间长短有一定关系。因此，如果能结合母国企业国际化进程对母国贸易效应作动态研究和长期趋势分析，可能有更大的现实意义。

四、参考文献

（一）英文文献

- [1] Amighini A A, Rabellotti R. Outward FDI from Developing Country MNEs as a Channel for Technological Catch-up[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10,23(2).
- [2] Bandick R, Karpaty P. Foreign Acquisition and Employment Effects in Swedish Manufacturing [J].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Research Paper No. 2007/35.
- [3] Belderbosa R, Sleuwaegen L. Tariff Jumping FDI and Export Substitution: Japanese Electronic Firms in Europ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1998,26(1):175-192.
- [4] Becker, et al. Location Choice and Employment Decisions: A Comparison of German and Swedish Multinationals[J].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2005,141(4):693-731.
- [5] Behera S R, Dua P, Goldar B.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echnology Spillover: Evidence across India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J]. The Singapore Economic Review,2012,57(2):1-36.
- [6] Bergsten C F, Horst T, Moran T H. American Multinationals and American Interests[M]. Bookings Institution, 1978.

- [7] Bitzer J, Kerekes M.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ransfer Technology across Borders? New Evidence[J]. *Economics Letters*, 2008, 100(3): 355-358.
- [8] Blomstrom M, Konan D, Lipsey R. FDI in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Japanese Economy[C]. NBER Working Paper 7693, 2000.
- [9] Blonigen B. In Search of Substitution Between Foreign Production and Export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1, (53): 81-104.
- [10] Braconier H, Ekholm K. Swedish Multinationals and Competition from High and Low Wage Locations[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0, 8(3): 448-461.
- [11] Braconier H, Ekholm K.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Employment Effects in the EU[J].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s*, 2001(4): 561-562.
- [12] Brainard S L. A Simple Theory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Trade with a Trade-off between Proximity and Concentration[C]. NBER Working Paper 4269, 1993.
- [13] Brainard S L, Riker D. US Multinationals and Competition from Low Wage Countries[C]. NBER Working Paper 5959, 1997.
- [14] Branstetter L. I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 Channel of Knowledge Spillovers? Evidence from Japan's FDI in the United Stat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6, 68(2): 325-344.
- [15] Chen, Ku. The Effect of Overseas Investment on Domestic Employment: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ast Asia[C]. NBER East Asia Seminar on Economics, Volume 14, 2005.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6] Cozza C, Rabellotti R, Sanfilippo M. The Impact of Outward FDI on the Performance of Chinese Firms[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5, 36: 42-57.
- [17] Cowling K, Tomlinson P R. The Japanese Model in Retrospective: Industrial Strategies, Corporate Japan and the 'Hollowing out' of Japanese Industry[J]. *Policy Studies*, 2011, 32(6): 569-583.
- [18] Deschryvere M, Ali-Yrkko J. The Impact of Overseas R&D on Domestic R&D Employment[M]. *The Oxford Handbook of Offshoring and Global Employment*, 2013: 238-239.
- [19] Dhyne E, Guerin S 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Domestic Performance: In Search of a Causal Link[R]. The National Bank of Belgium Research Department, 2012.
- [20] Driffill N, Love J H, Taylor K. Productivity and Labor Demand Effects of Inward and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n UK Industry[J]. *The Manchester School*, 2009, 77(2): 171-203.
- [21] Dunning J. Explaining Changing Patterns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in Defence of the Electric Theory[J].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79(41).
- [22] Dunning J.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n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M].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81.
- [23] Dunning J. The Electric Paradigm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 Restatement and Some Possible Extension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88(19).
- [24] Eaton J, Tamura A. Japanese and US Exports and Investments as Conduits of Growth [C]. NBER Working Paper 5457, 1996.
- [25] Gopinath M, Pcoik D, Vasavada U. The Economic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rade with an Application to US Food Processing Industry [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e Economics*, 1999, 81: 442-452.
- [26] Guerin S S, Dhyne 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Domestic Performance: in Search of a Causal Link[J]. *Working Paper Research*, 2014.
- [27] Head K, Rise J. Offshore Production and Skill Upgrading by Japanese Manufacturing Firm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2, 58: 81-105.
- [28] Head K, Rise J. Overseas Investment and Firm Exports [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1, 9(1): 108-122.
- [29] Hewings GJD et al. The Hollowing-out process in the Chicago Economy, 1975-2011[J]. *Geographical Analysis*, 1998(30): 217-233.
- [30] Hanson G, Mataloni R, Slaughter M. Expansion Abroad and the Domestic Operations of US Multinational

Firms[C].Tuck School of Business, Dartmouth working paper,2003.

- [31] Harrison A, Mcmillan M. Outsourcing Jobs? Multinationals and US Employment[C]. NBER Working Paper, 2006.
- [32] Horst T. The Industrial Composition of US Exports and Subsidiary to be Canadian Market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2,62:37-45.
- [33] Helpman E, Krugman P. Market Structure and Foreign Trade: Increasing Returns, Imperfect Competi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M]. Cambridge: MIT Press, 1985.
- [34] Helpman E, et al. Export versus FDI with Heterogeneous Firm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4,(94):300-316.
- [35] Herzer D, The Long-run Relationship between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Evidence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011,47(5):767-785.
- [36] Hijzen A, Gorg H, Hine R. International Outsourcing and the Skill Structure of Labour Demand in the United Kingdom[J]. Economic Journal, 2005, Vol. 115, No. 506:860-878.
- [37] Hijzen A, Tomohiko I, Yasuyuki T. The Effects of Multinational Production on Domestic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Japanese Firms [J]. Discussion Papers,2006.
- [38] Kim Y J. A Model of Industrial Hollowing-out of Neighboring Countries by the Economic Growth of China[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7,18(2):122-138.
- [39] Kojima K.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a Japanese Model of Multinational Business Operations[M]. London: Groom Helm, 1978.
- [40] Kokko A. The Home Country Effects of FDI in Developed Economies[C]. European Institute of Japanese Studies Working Paper No.225, 2006.
- [41] Konings J, Murphy J. Do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Relocate Employment to Low — Wage Regions? Evidence from European Multinationals [J].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2006,142(2):267-286.
- [42] Koopman R., Powers W, Wang Z, Wei S.J. Give Credit to Where Credit is Due: Tracing Value Added in Global Production [C]. NBER Working Paper 16426, 2010.
- [43] Liang R, Bing L.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Industry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Analysis and Testing on Data of Republic of Korea[C].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IEEE, 2011:614-618.
- [44] Lim S, Moon H. Effects of Outward Foreign Investment of Home Country Exports: the Case of Korean Firms [J]. Multi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01(1):42-50.
- [45] Lin Z J. Taiwan Investment in China and Structure Change[C]. Conference on Emergence of the Chinese Economy and East Asia's Response, 2004.
- [46] Lipsey R, Weiss M Y. Foreign Production and Exports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63, No.4, 1981.
- [47] Lipsey R, Ramstetter, Blomstrom M. Outward FDI and Parent Exports and Employment: Jap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weden [J]. Global Economy Quarterly, 2000,1(4):285-302.
- [48] Markusen J R, Maskus K E. Multinational firms: Reconciling Theory and Evidence [M]. Topics in Empirical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Robert E Lipse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71-98.
- [49] Masso J, Varblane U, Vahter P. The Effect of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n Home-country Employment in a Low-cost Transition Economy [J]. Eastern European Economics, 2008,46(6):25-59.
- [50] Minoru I. Hollowing-out of the Japa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Regional Employment Development[C]. Working Paper, Japan Institute for Labor Policy and Training, 2006.
- [51] Mundell R.A.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actor Mobility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7, 47(3):1269-1278.
- [52] Patrie A. The Regional Clustering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rade[R],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 1994, DEC.
- [53] Pfaffermayr M.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Exports: a Time Series Approach [J]. Applied Economics,

1994(26):337-351.

- [54] Pradhan J, Singh N. Outward FDI and Knowledge Flows: a Study of the Indian Automotive Sector[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es, 2009,1(1):156-187.
- [55] Slaughter.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Outsourcing, and American Wage Divergence [C]. NBER Working Paper 5253, 1995.
- [56] Svenson L. Foreign Investment and Mediation of Trade Flows [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4,12(4):609-629.
- [57] Vernon 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66,80:190-207.
- [58] Wang Z., Wei S., Yu S., Zhu K. Measures of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Global Business Cycles[C]. NBER Working Paper 23222, 2017.

(二) 中文文献

- [1] 白洁. 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J]. 世界经济研究, 2009(8):65-69.
- [2] 边婧,张曙霄.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J].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vol.34(5):34-43.
- [3] 蔡冬青,刘厚俊. 中国OFDI反向技术溢出影响因素研究[J]. 财经研究, 2012(5):59-69.
- [4] 曹玲. 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D]. 吉林: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 2013.
- [5] 柴庆春,胡添雨.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基于对东盟和欧盟投资的差异性的考察[J]. 世界经济研究, 2012(6):64-69.
- [6] 陈俊聪,黄繁华. 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结构优化[J]. 国际贸易问题, 2014(3):113-122.
- [7] 陈培如,冼国明.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对“替代”和“互补”效应并存的一种解释[J]. 当代财经, 2018(9):102-113.
- [8] 陈强,刘海峰,汪东华,徐驰.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能否产生逆向技术溢出效应?[J]. 中国软科学, 2016(7):134-143.
- [9] 陈元朝. 国际代工模式下的本地产业空心化危机研究——基于长三角的实践[J]. 现代经济探讨, 2007(10):68-71.
- [10] 陈愉瑜. 外向直接投资与中国外贸演化:机理与实证[D]. 浙江: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2012.
- [11] 戴翔. “走出去”促进我国本土企业生产率提升了吗?[J]. 世界经济研究, 2016(2):78-89.
- [12] 杜金涛,滕飞. 基于吸收能力视角的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内技术进步影响研究[J]. 经济问题探索, 2015(11):152-185.
- [13] 付海燕.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基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实证检验[J]. 世界经济研究, 2014(9):56-61.
- [14] 顾雪松,韩立岩,周伊敏. 产业结构差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中国—东道国”视角的理论与实证[J]. 经济研究, 2016(4):102-115.
- [15] 韩家彬,贺洋. 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出口贸易效应——基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比较分析[J].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Vol.21(2):81-88.
- [16] 黄晓玲,刘会政.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分析[J]. 管理现代化, 2007(01):45-48.
- [17] 贾妮莎,申晨.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制造业产业升级效应研究[J]. 国际贸易问题, 2016(8):143-153.
- [18] 蒋冠宏,蒋殿春.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J]. 经济研究, 2014(5):160-173.
- [19] 姜亚鹏,王飞.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母国就业效应的区域差异分析[J]. 上海经济研究, 2012(7):43-53.
- [20] 孔凡爱.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基于投资动机的视角[D]. 山东:山东大学经济学院, 2014.
- [21] 李磊,张换兆,朱彤. 土地“尾效”、泡沫与日本经济增长[J]. 日本研究, 2008(3):31-35.
- [22] 李磊,白道欢,冼国明. 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了母国就业——基于中国微观企业数据的研究[J]. 经济研究, 2016(8):144-158.
- [23] 李京晓.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宏观经济效应研究[D]. 天津: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2013.

- [24] 李梅,柳士昌.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地区差异和门槛效应——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门槛回归分析[J]. 管理世界, 2012(1):21-32+66.
- [25] 李梅,袁小艺,张易. 制度环境与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J]. 世界经济研究, 2014 (2):61-74.
- [26] 李夏玲,王志华. 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贸易结构效应——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 2015(4):138-144.
- [27] 李杨,车丽波. 中国OFDI的贸易产品结构效应——基于国家异质性的分析[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Vol.46(4):145-152.
- [28] 梁文化, 刘宏. 对外直接投资驱动中国技术进步的机理与实证研究——基于比较视角的分析[J]. 经济问题探索, 2017(2):111-117.
- [29] 廖庆梅.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就业效应研究[D].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 2017.
- [30] 林建勇. 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发展的影响研究[D]. 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2018.
- [31] 刘斌,王杰,魏倩. 对外直接投资与价值链参与:分工地位与升级模式[J]. 数量经济技术研究, 2015(12):39-55.
- [32] 刘海云,毛海鸥. 国家国际分工地位及其影响因素——基于“GVC地位指数”的实证分析[J]. 国际经贸探索, 2015(8):44-53.
- [33] 刘海云,喻蕾.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空心化效应研究——基于东部地区工业数据的实证分析[J].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4(9):77-83.
- [34] 刘海云,聂飞. 中国OFDI动机及其对外产业转移效应——基于贸易结构视角的实证研究[J]. 国际贸易问题, 2015(10)
- [35] 刘明霞.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基于技术差距的影响分析[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0(3):16-21+142.
- [36] 刘新宇.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研究[D]. 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 2016.
- [37] 陆书哲.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经济效应研究[D]. 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 2017.
- [38] 罗军. 民营企业融资约束、对外直接投资与技术创新[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17(1):96-103.
- [39] 马淑琴, 张晋.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能导致产业空心化吗?——以浙江和广东为例[J]. 经济问题, 2012(7):32-34.
- [40] 毛其淋,许家云.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抑或抑制了企业出口?[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4(9):3-21.
- [41] 聂明华, 徐英杰.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与全球价值链升级[J]. 科技管理研究, 2016(15):153-158.
- [42] 潘素昆,袁然. 不同投资动机OFDI促进产业升级的理论与实证研究[J]. 经济学家, 2014(9):69-76.
- [43] 任丽丽. 我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分析[D]. 辽宁:辽宁大学经济学院, 2013.
- [44] 沙文兵. 东道国特征与中国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J]. 世界经济研究, 2014(5):60-74.
- [45] 石柳,张捷. 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空心化”的相关性研究——基于灰色关联度的分析[J].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13(2):52-64.
- [46] 宋勇超.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J]. 经济经纬, 2015(3):60-65.
- [47] 隋月红,赵振华. 我国OFDI对贸易结构影响的机理与实证——兼论我国OFDI动机的拓展[J]. 财贸经济, 2012(4):81-89.
- [48] 唐英杰.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及其启示[J]. 国际贸易, 2009(12):65-70.
- [49] 唐心智.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分析[J]. 统计与决策, 2009(6):120-121.
- [50] 王金亮. 基于上游度测算的我国产业全球地位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4,(3):25-33.
- [51] 王阳.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2016.
- [52] 吴书胜,李斌.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非线性效应研究[J]. 世界经济研究, 2015(9):74-85.
- [53] 项本武. 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基于中国的经验实证分析[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06(3):9-15.
- [54] 邢晓丹.“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基于对东盟和欧盟的比较研究[D]. 山东: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 2015.
- [55] 王英, 周蕾.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 中国地质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13(6):119-124.

- [56] 王英,刘思峰.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反向技术外溢效应的实证分析[J]. 科学学研究, 2008(2):294-298.
- [57] 杨晨. 产业集聚视角下省际OFDI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J]. 经济论坛, 2017(5):86-90.
- [58] 杨平丽,张建民. 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J]. 亚太经济, 2016(5):113-119.
- [59] 杨连星,罗玉辉.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全球价值链升级[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7,34(6):54-70.
- [60] 叶娇,赵云鹏. 对外直接投资与逆向技术溢出——基于企业特征的分析[J]. 国际贸易问题, 2016(1):134-144.
- [61] 殷朝华,郑强,谷继建. 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中国自主创新吗——基于金融发展视角的实证研究[J]. 宏观经济研究, 2017(8):69-85.
- [62] 尹东东,张建清.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基于吸收能力视角的实证分析[J]. 国际贸易问题, 2016(1):109-120.
- [63] 于冰.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基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东道国比较分析[D]. 山东:山东大学经济学院, 2014.
- [64] 袁东,李霖洁,余淼杰. 外向型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公司生产率——对母公司特征和子公司进入策略的考察[J]. 南开经济研究, 2015(3):38-58.
- [65] 张春萍.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2012(6):74-85.
- [66] 张宏, 王建.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全球价值链升级[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 [67] 张建刚,康宏,康艳梅. 就业创造还是就业替代——OFDI对中国就业影响的区域差异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3(1):126-131.
- [68] 张远鹏, 李玉杰. 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J].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14(6):1-15.
- [69] 赵伟,江东. 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产业升级:机理分析与尝试性实证[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 40(3):116-125.
- [70] 赵宸宇,李雪松. 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技术创新——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J]. 国际贸易问题, 2017(6):105-117.
- [71] 郑磊. 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行业数据分析[J]. 经济问题, 2012(2):47-50.
- [72] 周婷.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基于价值链升级的视角[D].江苏: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 2018.
- [73] 朱彤,崔昊.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与中国技术进步[J]. 世界经济研究, 2012(10):60-67.